

中国共产党 湖北历史大事记

(1919·5——1949·10)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湖北历史大事记

(1919·5——1949·10)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

(1919.5—1949.10)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 冈 报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插页 20万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130

ISBN 7—216—00973—8

D · 253 定价：3.90元

出版说明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19年5月~1949年10月)》概要地记述了中共湖北地方组织领导湖北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前进的历程。它实际上是一本简明的编年体的中共湖北断代史。本书可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党史专业工作者学习与研究中共湖北历史的参考读物和工具书。

本书力图展示历史的真实面目，以帮助读者客观地了解历史过程，全面地吸取历史经验，更好地知史明鉴，理解现实，缅怀先烈，继往开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书中所涉史料均根据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进行过反复核实，所列条目既依时间顺序排列，又按事件和问题相对集中，尤其注重各个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力求单个事件完整，总体脉络清晰。

本书由张学奇、康裕震主编，胡传章、方城任副主编，周少华、邹东山、李福珍、刘淳参加编写。它凝聚着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诸多同志多年的心血，吸取了党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初稿完成后，曾邀请省党史学界专家学者和各地市州县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进行审阅，许多同志提出了宝贵的修改补充意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功归于众，它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仍难免讹误疏漏。敬请各位前辈、党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

1992年6月

目 录

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1919年5月~1923年6月).....	(1)
二、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23年6月~1927年7月).....	(28)
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82)
四、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148)
五、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10月).....	(220)

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1919年5月~1923年6月)

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湖北是奠定其组织基础的重要省区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的反动统治，是近代中国民族灾难、人民痛苦、国家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地处华中、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湖北，迅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腹地的重要据点。为了救国救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展开英勇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反复地进行艰苦的探索。但是，这些斗争和探索，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以1911年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历史证明，在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一个以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日益激化，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结果，1919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之下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使这一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成为现实可能，因而也就造成

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湖北地区得以创建的必要条件。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破产的过程中，湖北工人阶级便从外国在华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企业中产生并壮大起来。从1861年起，英、德、俄、法、日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在武汉设租界、开工厂。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张之洞开始在武汉和大冶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又陆续在宜昌、沙市、沙洋、大冶、当阳、竹山、阳新等地设厂开矿。与此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武汉地区和一些市县出现，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较大发展。到1920年，全省工矿企业达1000处以上，近代产业工人接近30万（其中武汉地区10余万），位居全国第二。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湖北工人阶级，绝大部分集中于武汉等大中城市，苦难尤为深重。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湖北地区有记载的工人罢工就达20余次。无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和斗争的日益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湖北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1915年兴起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湖北地区涌现出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勇猛斗士。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思潮在湖北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以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则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始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对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各种流派进行了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治中国的最好的思想武器，使马克思主义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等思

潮而在湖北先进思想界占居主导地位，并开始致力于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实践，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湖北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干部条件。

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的影响和推动下，经过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等先进分子的积极活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应运而生。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6个共产党地方组织之一，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了创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奏响了湖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雄壮序曲。而在党的“一大”以后相继成立的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则把这一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这一历史阶段的显著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日益广泛、日益深入的结合，是“位于全国前列”的“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武汉罢工“狂潮”。1921年10月~12月，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先后罢工，拉开了这一“狂潮”的序幕。从1922年1月起，全省工人阶级的广泛团聚，随之相继取胜的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汉口湛家矶扬子机器厂、汉口英美香烟厂、汉口租界花厂和大冶铁矿的工人罢工斗争，展开了这一“狂潮”的洪波大澜。1923年2月，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便把武汉的罢工“狂潮”，也把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到了顶点。当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使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湖北的共产党人又从血泊中奋起，带着通过斗争实践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投身到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1919年(5月~12月)

5月5日~6月下旬 武汉地区掀起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群

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并发展到黄州、沙市、宜昌、襄樊等地。

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将德国侵占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日本的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接受这一决定的卖国行径，遭到军阀政府镇压。5日，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同日，武汉报纸开始刊登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消息。6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恽代英与中华大学学生林育南商议后拟定传单《(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之事》，指出“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密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呼吁有血性的炎黄子孙都“不应当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勿“认贼作父”。7日，中华大学学生沿街散发。9日，武昌各校学生代表集会于中华大学，决定以武昌学生团名义，向北京学界发电声援。会议推举恽代英起草武昌学生团宣言书，选派林育南等分赴武汉各大中学校联络。17日，由武昌学生团扩充而成的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会后，全体代表赴湖北督军公署和湖北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承认学生联合会，准许学生集会游行，并请省署致电北京政府，力争山东青岛主权。从18日起，学生多次举行游行、集会、演讲，商界渐起响应，工人也开始行动。29日，武汉学联创办的《学生周刊》出版。31日，武汉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中华大学集会，议决6月1日起实行总罢课，并发表《武汉学生罢课宣言》，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和约，罢斥卖国贼，给学生以爱国自由。

6月1日晨，武汉近6000学生实行同盟罢课，拟于12时开始游行演讲。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瑤调集大批军警包围中华大学等校校园。爱国学生纷纷冲破军警防线，奔赴演讲地点。军警沿途追阻殴击，大打出手。暴行延至3日，共殴伤学生38人，逮捕学生数十人，酿成“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武汉各校校长

召开会议，决定赴省署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撤除各校门前军警；武汉学联向省议会递交请愿书，抗议军警暴行，要求弹劾警务处长，通电全国揭露王占元镇压学生的罪行。3日，北京学生20余人来汉进行声援和宣传活动。同日，武昌律师公会副会长施洋提出援救学生案，呈请法庭提起公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学生，恢复学生自由。此后，省议会议员，以及武昌、汉口商会和湖北旅宁、旅沪、旅京等同乡会，也相继出面援救学生，谴责当局，要求严惩凶手。7日，恽代英、施洋等发起组织汉口各团联合会，发动商界罢市。10日，汉口数十家商店罢市。11日，汉口英法租界及各闹市区罢市。12日，武昌全城罢市。在此前后，武汉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有组织地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举行反帝政治罢工，成为运动的主力。5月下旬，汉口日资企业泰安纱厂工人罢工。6月5日，汉口英租界平和、荣茂两花厂工人罢工。自7日起，武汉三镇其他部分工厂、行业及外国在华企业的工人相继罢工，尤其是武汉各轮船公司商轮、码头工人继上海水手、火夫罢工之后于11日举行的同盟罢工，顿使上海、汉口间航运“全然在杜绝状态”。同时，武汉各厂工人还在酝酿总同盟罢工。黄州、安陆、黄陂、沙市、宜昌、武穴、阳新、襄樊等地的学生和商界也纷纷罢课罢市。慑于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迅猛发展，湖北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发生在武汉及省内部分地区的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是全国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运动中起领导和核心作用的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施洋、黄负生、李求实、李书渠（伯刚）等，从此认识到“全国人民之大团结”才能“为大规模之运动”，并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7月12日 武汉学生联合会、汉口各团联合会、武昌律师公

会等18个团体的代表在汉口辅德学校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各界(团体)联合会，以“健全民气团体”，“监督政府”，与京、津、沪、湘等地各界联合会一致行动。会议推举施洋、马刚侯等13人组成筹办处。8月18日，该会在汉口正式成立。随即派施洋赴京请愿，要求政府以直接交涉的方式解决中日间一切悬案，补签对德条约。

7月31日 汉口各铁业店数千名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此后半月内，汉口炭业工人、武昌麻布局工人、汉口大智门面粉厂工人、汉口数百家成衣店工人亦因工资微薄、不敷膳食之用而相继罢工。

8月 董必武从上海返回武汉，准备从办报纸和办学校入手，宣传革命，唤起民众。作为老同盟会员的董必武，在其投身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以后，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于是于2月由鄂抵沪，与原同盟会员张国恩主持湖北旅沪同乡组织的湖北善后公会会务，参加了五四运动。董必武旅沪期间，与由日本回国的湖北潜江人李汉俊研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分析、比较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抉择。旋又与由汉赴沪的陈潭秋晤谈中俄革命道路问题。返汉后，即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0月6日 李汉俊致函董必武。信中说：“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此前，正同湖北教育会内反对新思潮的一派人物进行斗争的董必武，曾致函李汉俊说“湖北的教育会弄得糟”。接此复信后，他既赞同李汉俊这种根本改造社会的观点，又主张从细微小事做起，逐步建树伟大的革命业绩。

次年1月1日，李汉俊这封信以《改造要全部改造——一封答朋友的信》为题，在上海《建设》月刊发表。

10月25日 汉口所有成衣店3000余工人联合一致，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全行业同盟罢工。此后直至12月，又有武昌盐业工人、纸业工人、染坊工人、铜业工人、碾米坊工人相继罢工。

12月 武汉、襄阳、宜昌等地工学商界纷起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上月在福州制造惨案的暴行。13日，武汉28所大中学校组成近5000人的请愿团赴省长公署请愿，迫使省政当局答允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活动。16日，武汉学生和市民数万人在汉口爱国花园举行国民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大会通电全国，呼吁“一致协争，以重国权而申民意”。

1920年

2月1日 恽代英和林育南、廖焕星、李书渠等以互助社等团体为基础创办的利群书社在武昌正式成立。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实验“共同生活”的“互助主义”，经销各种新思潮书刊，先后同上海《新青年》杂志社、长沙文化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和稍后亦由恽代英创办的进化书社、时中书社同为《新青年》在武汉的代派处。随着恽代英等逐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该书社遂成为武汉地区乃至长江中上游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影响了如肖楚女、吴德峰、施洋以及湖南的蒋先云等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次年6月7日，书社因军阀兵变而遭焚毁。

2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武昌工学互助团发起人之一梁空撰写的《武汉工厂调查》一文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发表。该文介绍了武昌造币厂、徐家棚粤汉铁路机器厂和汉阳铁

厂，以及汉口江岸蒸木厂、工务厂、京汉铁路机器厂、湛家矶造纸厂的设备、组织、职工人数、工资状况与劳动时间，并介绍了汉阳铁厂的沿革和两次罢工情形，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初步了解工人阶级状况的首次调查报告。

2月4日 陈独秀应邀由沪抵汉讲学。5日~7日，在文华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汉口堤口下段保安会和小关帝庙等处发表演说，宣传“平民社会主义”和“新教育之精神”，指出工商业和交通发达的武汉“将来必为全国最重要之区”，武汉进步知识分子应予“特别注意”。在此期间，他委托文华大学工人郑凯卿调查武汉地区工人情况，并请新闻记者包惠僧予以协助。陈独秀的这些活动，对武汉地区正在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向工人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月 董必武等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正式建立。陈潭秋、陈荫林、钱介磐、刘子通、黄负生相继应聘任教。该校男女兼收，提倡白话文，灌输新思想，成为武汉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4月4日 恽代英、施洋、李书渠、包惠僧等发起组织的湖北平民教育社正式成立，施洋任总务主任。5月18日，董必武、陈学渭、宛希俨等组织进步学生成立读书团体人社，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稍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钱介磐等创建新教育社和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创办刊物《新教育》。这些团体在武昌开办多处平民学校或工读学校，以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其子女为主要对象进行义务教育，帮助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学习自身求解放的道理，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同湖北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春 恽代英离汉赴京，主持《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编辑工作。在京期间，恽深受李大钊影响，相继著文表示相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明确主张从根本制度上全部改造世界。6月返回武昌。

5月4日 《汉口新闻报》发表短评《纪念五四》，称五四运动为“学生潮震荡时局之第一声”，使“官僚军阀所疾首痛心”。

6月1日 《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发表王崇植《武汉工厂纪略》一文。该文主要记述汉阳铁厂、大冶矿厂、大冶钢铁厂、汉口扬子机器有限公司、湛家矶造纸厂、湖北兵工厂、湖北水泥厂、武昌电话局、武昌无线电台的设备和生产情形，同时也反映了工人工资和劳动的一些状况，披露了工人所处的“处处足以丧人性命”的劳动环境和如陷“人世间的三十六层地狱”的悲惨生活。

6月26日 陈学渭、林育南、卢斌（陆沉）等发起成立诚社，以改造自身、改造社会、发展乡村运动为宗旨。

6月 介绍俄国情况的《劳农政府与中国》一书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刊行。该书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劳农政府的宪法、土地国有法、教育等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并赞扬列宁的奋斗精神。

7月7日 率湖南各界驱张（敬尧）代表团赴北京转上海的毛泽东途经武汉回到长沙。在武汉停留时，同恽代英等商讨了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及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联系等问题。

夏 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李汉俊致信董必武、张国恩，约其在武汉组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即联系陈潭秋，一同进行建党活动。

8月 曾在广州从事社会主义思潮宣传工作的原同盟会员、湖北鄂城人刘伯垂（刘芬）受陈独秀委托，由沪回汉组党。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包惠僧、郑凯卿就组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在武昌抚院街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组织的名称，董必武回忆为“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陈潭秋回忆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回忆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后通称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会议由刘伯垂主持，研究了

组织生活制度，决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选举包惠僧为小组负责人。小组成立后，开始在武汉中学等校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时逐步同人力车、纺织、搬运、轮驳、铁路、兵工、香烟等行业工人建立联系。

9月1日 《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署名“文华大学学生”的《武昌五局工人状况表》。该表即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对武昌织布局、纺纱局、麻布局、铜币局、银币局工人状况的调查。该刊同期所载刘云生《汉口苦力状况》一文，详细叙述了汉口码头搬运工人的来源、苦难生活状况和致死原因，指出他们“若异类之不如”，“所受之痛苦，实人生之最难堪者”。

9月 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到中国的俄共（布）党员小组成员马迈耶夫及其夫人由上海来武汉，与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商谈，拟办一外语补习学校作为宣传中心，协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不久，马迈耶夫再次到汉，进一步了解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

10月10日和25日 恽代英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上发表译文《英哲尔士论家庭起源》（即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节译），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恩格斯的这部著作。

10月24日 董必武、张国恩、钱介磐等发起组织132名教育工作者在武昌举行大会，揭露湖北省教育会会长谢石钦为王占元张目、反对教育改革、侵吞公款等恶劣行径。大会推举董必武等筹备、组建新教育会。事后，谢石钦指使其弟谢仲奇以“诬蔑名誉，妨害秩序”为由，向武昌地方检察厅控告董必武等。11月19日，地检厅开庭预审，董必武等当庭据理驳回，谢仲奇败诉撤案。

11月7日 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举行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

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共18人。会议由董必武、包惠僧、李书渠等主持，确定团的名称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宗旨为“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并规定了团的组织制度。1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19人。刘伯垂作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发言。董必武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武汉工人组织状况及近期罢工情况。不久，汉口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1月 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批评恽代英上月发表于《互助》第1期的《未来之梦》。文章指出，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在乡村发展教育与实业，从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只不过是一种梦想。恽代英及利群书社其他成员从这一批评中受到极大震动。

11月 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武昌成立。该会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有会员20余人。不久，汉口也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2月19日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派包惠僧、赵子健到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厂调查工人状况。26日，他们在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报告了调查结果。次年4月9日，包惠僧（已于年初离开武汉）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一文。文章列举事实说明武汉工人的生活“有十二分的痛苦”，提出通过发展劳工教育、实行劳工组合、组织劳工俱乐部等办法提高工人觉悟，号召广大工人“快快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实现人类的福利”。

冬 李汉俊从上海回潜江停留武昌，向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介绍唯物史观，并应董必武邀请向武汉中学学生讲授社会主义

理论。

1921年

1月2日 《武汉星期评论》创刊。该刊由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旋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公开出版物，积极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不久，由于黄负生、刘子通相继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该刊遂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直接领导的党刊，在团结武汉文化界进步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月 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翻译的《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由新青年社出版。该书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同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基本理论读物。

3月1日 《汉口新闻报》刊载《俄共产党之宣言》，向湖北人民介绍了俄共(布)领导革命与建设的主张。《宣言》称俄国共产党将“竭尽全力以御外侮，借外债以兴实业，收土地林矿为国有，阻反共产派之宣传，厉行普及教育，保护劳农俄国”。

5月1日~2日 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抗议车行将每车月租增加100文的决定。车行被迫收回成命。3日，工人复工。此前，汉口鞋业工人和刻字工人曾为要求增加工资于三四月间举行罢工。7月19日，武昌第一纱厂1500余名工人也为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均分红利举行了同盟罢工。

6月 田诚撰写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单行本在汉口印行。文章指出：共产主义是极合科学的能解放人类的唯一主义。要实现这个理想的社会，必须进行阶级斗争。第一步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第二步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文章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抛弃“教育